

澳大利亚重大的商业倒闭事件： 对 HIH 保险公司倒闭的反思

（澳大利亚）Dr. Tina Mak 著 郭 茜 译

原载：Journal of American Academy of Business Mar 2005

前言

本文的目的在于分析 HIH 的倒闭及其的审计师安达信公司的职责，分析是在包含考古学和权利与知识的系谱的福柯框架下进行的。神种的 Jedi 力量则被用作会计职业自称有专用于公众利益的较优知识和技能而获得的能力的比喻说法。因此，这种力量包括职业道德。阴暗面则被用为 HIH 倒闭的比喻说法。因为会计标准和会计实务，会计职业的能力基础都被用来隐瞒即将发生的倒闭，结果给保单持有人、债权人和普公众带来逐步增加的损失。

对本文来说，对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介入 HIH 倒闭事件的管理上的反应被看作是绝地大反攻。因为公司法经济改革方案（CLARP9）的建议目的在于增强包括审计独立性的公司治理。换句话说，CLERP9 是打算把会计和审计的能力，知识和技术转到保护公众利益方面。本文的重要性以及其它力量的比喻在于会计职业一直用自称的专业知识、技能和道德在公司管理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与侵略者使更多的人或武器来征服较弱的被侵略者的方式是一样的。然而，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意外的公司倒闭案例提供了足够的证据证明这种专业力量常常被用来损害公众利益，因此，如果这个职业是符合公众期望的话，它将不得脱离阴暗而是成为公众利益的帮助者，以取得自己的地位。

本文是这样安排的。首先概述写本文的缘由，包括证明运用福柯框架是正确的理由。然后正式解释包括审计功能在内的概念，这些说明都是在福柯的范例，考古学，宗教学，系谱学、能动和知识的框架内进行的。在分析 HIH 倒闭和它的审计师安达信公司所牵连到的案情之前，本文将简要回顾一下公司倒闭事件。本文将以对意外的公司倒闭的管理方面的应的讨论为结果。尽管本文把重点放在一家澳大利亚的公司和澳大利亚对意外的公司倒闭在法律和管理上反应，但作者认为相同的事情在全世界都在发生。

转向“阴暗面”：澳大利亚的公司倒闭

澳大利亚的公司倒闭绝不是唯一的。英国和美国在 20 世纪 80 年代，90 年代以及最近也经历了类似的公司危机。研究表明官方对于最近澳大利亚公司倒闭所采取的措施与其他地方相似的调整改革模式有紧密的联系（Clarke et al., 2003）。研究进一步表明，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澳大利亚公司倒闭时间不断增加，而且许多都是意外的。

表一 一些已经倒闭的大公司（时间从 1981—1993）

年份	企业破产数目	年份	企业破产数目
1981	1,565	1994	7,772
1987	5,816	1995	7,240
1988	4,836	1996	8,964
1989	6,189	1997	8,666
1990	7,394	1998	7,920
1991	8,366	1999	7,617
1992	10,361	2000	8,650
1993	8,859	2001	10,015

资料来源：1981 公司事务委员会年度报告，1987—98 年数据来自 NCSC 和 ASC，1998—2002 年数据来自 ASIC。

以上数据显示：尽管与其他国家如英国，美国相比，破产公司数量仍相对较小，但澳大利亚在 20 世纪 80 年代中公司破产数量增加与澳大利亚公司数量是有关系的。Izan(1984)在报告中说：1962 年至 1982 年间，仅新南威尔士州每年每 1 万家登记注册的公司中平均有 77.1 家公司遭到清算。年公司破产率最高为 1977 年的 1.04%。在 1987 年 10 月股市崩溃带来的大萧条中，澳大利亚证监会（ASC）年度报告表明，国内公司破产率水平在 1989 年为 0.77%，1990 年为 0.88%，1991 年为 0.95%，1992 年为 1%，1993 年刚刚超过 1%，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下降为不到 1%。

当公司破产情况出现时，各个股东将面临失去其全部投资的风险，如失去退休金或债券价格下跌。这些损失的数量例示了安保协会公布的 1991 年估计值意指“我们公司的冒险投机的失败造成股东 80 多亿美元的损失”（Light 1990）。然而，塞克斯（1994）宣称这个数字要接近 200 亿美元。在 2001 年。仅 HIH 倒闭所造成的损失估计就接近 50 亿美元。在美国，五大公司包括安然，世界通讯和泰科公司就造成股东价值损失超过 4500 亿美元。

尽管有这些损失，仍然值得我们注意的是，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报告表明在阻止意外的公司破产或减少股东损失数量方面并没有什么改变。例如，委员会提到靠不住的对别人的钱是慷慨的，在 HIH 公司被清算之前，从该公司流出的“金钱的河流”就是这种慷慨的表现形式。基于委员会的证据，法官奈维尔·欧文提出公司首席执行官瑞·威廉姆斯从行政报酬、奖金中拿出数百万美元并在 HIH 倒闭之前资助同事和慈善事业（Maing,2002）。最后一轮的公司倒闭清晰地表明公司倒闭的成本在任何方面及对于涉及到的每一个股东来说都变的更加严重。尽管传统上一直是由审计员对意外的公司倒闭事件负责，但同时人们更加认识到经济状况经常复杂多变，公司董事与高级行政官员很难有效地引导公司度过困难时期。例如 Greatprax 等人。（1994）调查了 160 位澳大利亚的公司清算人并记录了他们对于公司倒闭原因的观察资料。倒闭的原因包括缺乏首席执行官管理技巧，过度依赖负债和没有足够的资本来继续发展和生存。然而，同过去的公司大灾难一样，21 世纪初同样将意外的公司倒闭归罪于审计师。不会出人意外地，审计失灵，公司治理道德已经成为热门讨论的话题。（Clarket 等人.,2003）

离开先前的倒闭事件，当前的指控多集中在审计师并没有独立地开展工作，而且为了保护提供给客户的非审计服务的营业收入软审计选择正成为追求对象。在安然公司和 HIH 公司倒闭和倒闭前的一段时间里一直是这两家公司选中的审计师安达信公司（它是五大审计师事务所之一）的失败就是一个适例。例如法官奈维尔·欧文发现尽管安达信将 HIH 评定为需要扩大风险管理的最高风险的客户。但是却没有制定风险管理计划。给委员会的证据也显示了为了既减少了成本又迁就 HIH 公司的经营部，被依赖的是内部控制而不是实质性测试。这种行为与安达信本身计划程序规程相违背。显然，这种情形在 HIH 最终倒闭之前盛行了几年（至少从 1999 年开始）。作为给委员会的证据，安达信对于同 HIH 审计有关的风险回应的一个最有力的方面就是，自 2001 年 2 月开始对这种状况进行监督，并且万一进行诉讼的话各种选择已被考虑到了。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对管理者的诚实也怀有疑问。另外，金融机构和新闻记者也受到批评。斯蒂芬·迈内（一家主要的独立在线新闻服务机构 crikey.com.au 的编辑）在 2001 年 8 月告诉乔治明斯特论坛，在 HIH 倒闭前 4 年里，位于悉尼的公司治理国际公司就已经在超出五个的公司治理评分中给 HIH 评零分。然而，采用公司治理国际公司这项服务的金融机构并没有依据这个信息来行事。迈内进一步批评了澳大利亚证券交易所、澳大利亚证监会和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在有证据表明这些公司存在问题时没有能够采取行动。

作为 HIH 倒闭的结果，管理改革开始进行了。例如，2002 年 8 月，公共会计和审计联合委员会在调查了。在澳大利亚和海外值得注意的公司破产事件之后发表了一份报告。该报告的目的在于探明在什么范围内必须增强公营部门和民营部门和私人部分审计的经管责任（JCOAA Report, 2002）。紧接着，澳洲财政部长科斯特洛发表了一个讨论文件，CLERP9，该讨论文件也设法满足了一些在 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2003 年 4 月发表的报告中已经提过的建议。在 CLEP9 提出的问题包括与审计师独立性相关的建议，审计和非审计服务之间的相互作用，审计师责任，会计标准，分析独立性，连续批露和资金筹集。通过要求总经理、财务官员和董事以声明的形式不经签字而批准帐户；照他们的看法，公司法 295A 款和进一步的要求董事们把首席执行官和首席财务官的声明形成的董事声明是接受 295（A）款，在他们看来，财务报表和票据与公司法（包括会计标准）一致并且显示公司财务状况的公允意见。CLEP9 改革不仅处理审计和会计问题，而且还处理了许多在最高涨与崩溃时期出现的引起怀疑的商业做法。包括在复杂的集团结构内国营公司和民营公司混合的财务，企业财产交易和其它通过广泛使用关联方交易的其它资产转移，在希望调整股东和经理的长期利益的情况下用股东期权来奖励经理；以衍生金融工具的形式利用债务和表外融资。

福柯：研究框架

为了理解 HIH 案例，从相互的视角来看澳大利亚的审计框架是非常重要的。运用布雷尔和摩根的社会框架，相互的审计研究框架包含的社会背景可以从 4 个不同的典型例子的假定下来观察，这四个不同的典型例子是激进的人本主义者、激进的结构主义者、功能主义者和说明性。这些典型例子在社会科学性质的假设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分析，即依次以存在论、知识论、人性和方法论为基础的。因此，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在这些范围内工作并吸收这些隐性假设的研究人员从传统或普遍运用客观维数（功能主义者）、转变到包含了

社会成份,这就是主观的(或说明性的)。将要应用与审计框架的福柯分析属于说明性典型例子的范围。福柯的视角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提供了一种观察外部世界的方法以及源于审计理论和知识的种种蕴涵,同时把审计研究范围扩大到全面包含社会因素。这为经常被忽略的重要的社会和动态因素通过考虑审计框架这一备择方法而变得引人注目提供条件。

福柯作品的重要部分论述了“能力”和“知识”的关系(Armsrong,1994)。由于对人类自称能了解最终真理的可能性持怀疑的态度,福柯提出了一个论点,根据这个论点真理和知识是被那些在特定历史时期占有支配地位的人定义和控制的。他的文章不仅仅是能力的描述,而是某些论文在发展过程中的支配趋势和这些论文在试图控制社会集体的政治规范中的地位的了解(Baker and Gendron,2002)。福柯的工作可被分为3个广泛的分析领域:对知识体系的分析、对能力的分析和个人通过自我约束来构成他们自身的自知之明的方法的分析(Davidson 1994; Prado, 1995)。福柯运用3个不同的分析方式来研究这3个领域:运用考古学来分析知识系统、运用系谱学来分析能力、运用伦理学来分析个人如何使自身成为伦理学的对象(Davidson 1994; Smart 1985)。

福柯最初应用一种从历史的视解考察各种事件的考古学方法。而且,按年月先后次序排列对这些事件加以描述。紧接着用系谱学来考察关键事件。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考古学方法的描述中成为重要的部分。最后,福柯提出了一种伦理分析的形式以便研究对各个个人发生作用的能力,因为他们把自己看成伦理学的对象(Prado, 1995)。福柯框架的引申解释辩称:回顾地考察福柯的工作,一个人可以观察系谱学的3个领域:考古学真理、系谱学能力和伦理的能力。真理是指人类科学产生的各类知识,能力是指“对象之间的关系,因为他们是彼此影响的”,并包含“政治结构、规则和标准体系、治理的指示和机构”。最后,伦理涉及到一个人得自己或自我设定为道义力量的关系,但这并没有脱离其它两方面的研究。在福柯研究了能力和主观构成之后,他的注意力转为更具体地集中在个人是如何被安排的和如何把他们构成伦理学对象(Hoy,1994:Hacking,1994:Davidson 1994)。事实上,福柯有关能力的研究是极为重要的,可能是社会分析最伟大的贡献之一(Clegg,1975:Smart,1985)。他对于能力的形成作用感兴趣,也对能力和知识的相互关系感兴趣。他特别关心个人自己的知识,包括他们的道德上的自我理解能够通过论文来构成,以及这些主观性如何逐渐服务于人们的主要理性观点的方式。

我们将运用福柯框架进行这项研究,研究是以考古学、系谱学、能力和知识为基础,或者与职业道德的观点结合起来,以HHH倒闭为例与为什么即使拥有渊博学识的审计职业不能防止重大的公司倒闭联系起来。

“能利”的考古学和系谱学

认识到需要对公司的财务报告进行审计是为了管理工作的利益将所有权同公司日常管理分离的结果。确保审计师工作有效完成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步骤就是根据AUS302(审计计划)的定义来规划过程。好的规划包括确定必需的所有背景信息以设计有效的审计方法。根据AUS302,“审计师应该为工作做计划使得审计工作可以有效的开展”(审计手册2003,第168页)。“计划”这一词意味着提出一个总体战略和一个针对审计的预期性质,时间安排和范围详细的方法。审计师期望以有效和及时的方式进行审计工作。充分的规划有助于

确保对于重要的审计领域给予合理的重视，潜在的问题被确定，工作迅速地完成。此外（审计手册 2003，第 168 页）为什么审计师应该恰当规划审计约定的主要原因是“获得被审计方的清楚的理解，使审计方能够对情况获得足够的适当的证据，确保进行具有成本效率的审计，避免被审计方的误解。”（Arens et al., 2002, pg. 236）尽管在“公众利益”，或者会计和审计如何为之服务上并不存在被普遍接受的定义，然而在 20 世纪会计专业团体提出的概念框架一直聚焦于对外财务报告的决策有用性。概念框架说明，如澳大利亚会计概念 2 公告（SAC2），坚持认为通用财务报表提供了一个手段，通过该手段经理部应对委托给他们的资源负责。这同历史管理责任概念和记帐的作用相一致。然而，这个狭隘的管理工作被扩展到对一般公众负有责任。它宣称当通用财务报表提供相关的可靠的信息之时，资源提供者将会运用这些信息来促进资源的经济配置（SAC2 通用财务报表的目的第 26、27 段；SAC3 财务信息的性质特征第 5 段）。资源的经济配置将对公众有益因为资源将只会被投入到那些能有效地和高效地使用这些资源并且遵守为使用这些资源而制定的规则的实体（SAC2 第 12、13 段）。通过在公众利益中所起的作用，职业会计师成为公众利益的“力量”。然而，极少量的职业会计团体没被授予作为审计师的权利。

从首次立法规定进行财务报表审计的时候起，作为概念框架方案的证据，财务报告的目的是为提供能够为经济决策提供可靠基础的信息。审计的目的在于增加这个信息的可信性。在 20 世纪发展过程中，审计的性质从最初的通过授权检查股票和收入的会计帐目发展为复杂的职业保证或风险管理服务。近来，审计也处理组织内欺骗行为（包括财务报表）的侦察和揭发（例如参见 AUS402）。审计范围和方法的这种演变成了判例法和其他经济因素（它们对审计师的社会期望有影响）随之而来的发展。

这些期望现在意味着审计师需要检查和分析经营过程和战略作为提供审计保证复杂过程的一个部分。质量审计是很必要的，它确保这一职业符合对客户、公众和依据独立的审计师来保持金融信息可信性的管理者的责任（Gill et al., 2001）。现代审计和保证服务的复杂和精致的性质被反映在多层次的管理框架中，这个框架包括审计、财务情况的回顾和检查，为确保质量审计提供不同层面的保证。理所当然的，独立性对这个管理框架的成功结果是至关重要的。简而言之，管理者（包括审计师）必须独立于规定之外。审计独立性历史上一直被看作是审计框架最可靠的柱石，最初是作为股东们在必要时在会计师帮助下执行的一个功能。随着审计功能演变成为经理部（董事）指定的职业会计提供的一种服务，所有权—管理权分离的进一步加深，独立性日益变为焦点。一个随之而产生的发展是对职业道德的日益关注，因为作为经理部指定的审计师被认为易于受压放弃他们的职业正直，为的是维持经理部的青睐，从而维持审计指定和审计费用。任何这类放弃的不可避免的结果是多米诺效益，所导致的最好结果是审计计划受到限制，最坏的结果则是审计计划不起作用。

审计师独立性在管理框架中的位置在职业规范的指导和标准中被作为例证，在澳大利亚，会计师和审计师的规范指导和实务准则是在澳大利亚会计研究基金会的赞助下公布的，该基金会是一个由澳洲特许会计师协会（ICAA）和澳洲会计师协会（CPAA）联合资助的团体。这些准则分为 9 个类别，审计师独立性在澳洲会计师协会和澳洲特许会计师协会的联合职业知道规范中的 B4 部分被提到：成员一定且应该摆脱任何可能被认为与正直和客观性不相一致的利益（不论其实际效应是什么）（审计手册 2003，第 1083 页）。换句话说，一个审计师既要不要被任何利益矛盾所阻碍，应又要被股东和依靠审计报告的第三方看成是客

观的和公正的。当审计师和客户经理部或董事之间存在不适宜的财务或其他关系时，审计报告的可靠性将合理地受到质疑。正如本文接下来的部分要讨论的，澳大利亚保险商 HHH 公司看上去是意外的倒闭在一定程度上可归因于审计师和 HHH 经理部之间缺乏独立性（Sexton, 2003）。另外，HH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说，在规章制度管理上存在严重缺点，这些规章制度管理本应成为造成该保险公司倒闭的某些管理活动的障碍/在下一部份将提到对澳大利亚保险业规章制度管理的理解。

澳大利亚保险调整框架：使用“力量”

在澳大利亚，那些想提供一般保险产品的组织需要满足偿付能力、行为能力和公司结构上的某些最低标准。满足这些标准，才能保留澳大利亚联邦谨慎的监督人的经营许可。另外，一般的保险公司服从，大体上适用于法人企业的公司和社会管理体制，并且受 1973 保险法案的约束。该法施加的一些审慎的要求，包括保险公司持有资本的最低限额和拥有足够的再保险保证金。保险事物局作为特别代理机构根据该法对一般保险公司进行监督。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这个代理机构演变为保险和退休金委员会，增加了监督退休金部门的责任。然而，在 1996 年，联邦政府委托财政系统调查局着手进行用于金融服务部门的管理框架的重大检查以确保其持续的效率和能力，检查的结果写成了沃里斯报告。沃里斯报告提出许多建议，这些建议对包括一般保险在内的金融管理系统的结构具有重大的意义。联邦政府接受了其中的许多建议。影响一般保险公司的主要的变化在于设立一个单独的审慎管理者，他有责任对整个金融服务部门进行谨慎的监督。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APRA）在 1998 年 7 月 1 日开始工作。除了设立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外对谨慎地管理一般保险公司的方法沃里斯报告并没有推荐具体的改变。

另外，在 1995 年，保险和退休金委员会开始了一个独立于沃里斯报告的项目以考虑关于一般保险公司的谨慎的管理框架的适宜性。结果，在 2002 年 7 月 1 日，保险改革法 2001 在进行了大量的更动后开始生效，本文下一部分将讨论这些变化，重点放在澳大利亚公司法的变化。这是澳大利亚在联邦政府 20 世纪 90 年代制定 CLERP9 的结果。从当前的观点看，管理框架（HHH 公司就是在该框架内经营的）包括公司法规定的适用于公开挂牌上市的公司的会计条款和审计条款。细察 HHH 公司处理资产、负债、收入和支出的方式，足以证明委婉地指出、可接受的会计实务帮助了隐瞒管理失误和不断恶化的财务稳定。差不多就一切情况而论，一般保险公司的主要债务是其未解决的索赔备抵，这个备抵是根据现有合同保险公司有责任偿付的未解决的索赔的成本的估计数。估计数的准确性对于保险公司的公布利润有重大影响。另外，这个估计数对于保险产品的定价和设计也很重要。在 HHH 倒闭之前，政府并没有要求一般保险公司任用保险精算师来估计未解决的索赔备抵。

HHH 的倒闭：帝国反击战

在 2001 年，HHH 公司因负债约 53 亿美元倒闭。HH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报告说首席执行官瑞·威廉姆斯和他的同事因大量的管理失误，大规模地收取过低的保险费、没能储备足够的资金来偿付索赔而造成了这个损失，这些情况都通过不足额准备，从而提

高利润使用金融再保险合同将损失转变为收益而小心地隐瞒起来。管理失误的另外证据是经理部决定进入美国和英国保险市场。实际上, HIH 公司发展得太快了, 而且显然地没有相称的财务控制。运营控制来支持这一扩张。实际上, HIH 的问题早在 1998 年底该公司为了成功地接管罗德尼·阿德勒保险公司而身陷债务时就出现了。回想起来, 在瑞·威廉姆斯开始为 HIH 公司最有利可图的部门——零售寻找买主时, HIH 公司的问题就显而易见了。从那时起, 公司股份开始 90% 的下跌。另外 HIH 的失败并不像其他一些公司那样不可预见。包括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澳大利亚证监会和媒体本应该有公众信任的, 在 HIH 倒闭前的 18 个月, 美林公司 J·p·摩根公司和其他公司的高级保险分析师就警告 HIH 经理部、董事、审计师和保险精算师还有许多保险经纪人, 以及最重要的政府管理者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 HIH 公司因对未来索赔的不足额准备而遭到损害。这些警告并未引起注意, 并且 HIH 公司甚至试图遏制一些批评的言论。正如可提出证据加以证明的那样, 在 HIH 公司宣布 1999-2000 年度下半年亏损 2200 万美元之后, 该公司的股票价格随后在 2000 年 9 月从 1.05 美元跌至 45 美分, 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本应该进行干预以保护投保人的利益。除了在 1999 至 2000 年度意识到股票价格下跌以外, 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本来也应该通过猜测 HIH 公司在对付新的资本难关时遇到困难而有所警觉。这导致了管理者未能保持向证券市场提供消息的另外缺陷。例如澳大利亚证监会就因没有负起通过保持正确地向市场提供消息以保证各公司达到披露责任的责任而受到指控。当时的情况似乎是市场总是被蒙在鼓里。一直到宣布 HIH 公司在 1999-2000 下半年亏损。

在隐瞒 HIH 公司即将发生倒闭上媒体也起了作用, 澳大利亚一家独立的新闻记者协会 (George Munster) 关于 HIH 倒闭的专门小组讨论揭露媒体, 包括马克·威斯特费尔 (“HIH: 澳大利亚最大的公司倒闭的内幕的故事”一文作者) 早在 HIH 公司倒闭前一年新闻界对该公司提出担心时就充分意识到 HIH 公司的可怕状况, 同样有大量的 HIH 经理部, 包括除瑞·威廉姆斯、罗得尼、艾德勒之外的董事和非执行董事在促使公司最终破产中都起了作用的证据。在过去, 董事们似乎只因为他们自己受到经理部多少有点轻蔑的对待。显然, 董事会未能控制住公司正在恶化的状况。当董事会最终对公司实施一些控制时危险已经不能挽回。对董事会和经理部改组 (这是董事会在 2000 年 10 月提出的), 可能已经迟了 2 到 3 年。尽管如此, HIH 仍能够继续向显然不提防的公众典当其产品, 告诉公众没有事情出错, 他们的保险金是完全安全的。另外, 在 2000 年 6 月, 董事会告诉股东 “在最近 6 个月内业绩会对市场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在 2000 年 12 月 15 日, 股东们还被告知 “董事会却认为准备充足, 并且这个观点在董事会寻求的最新的有独立见解的外部意见 (这是 HIH 公司当前的重构过程中的一部分) 中是得到支持。(Sexton, 2001, 第 3 页)

在 2000 年 10 月, 尽管在前一个财务年度流出 3.41 亿美元之后 1999-2000 年的经营活动又有 6.78 亿美元的现金流出, 但 HIH 公司的审计师安达信公司还是参加了掩盖并作出无保留意见的审计。内幕人仕知道公司最终将陷入财务清算, 而且在 2001 年 3 月 15 日发生了。例如罗得尼·艾德勒正好在这一天之前的一个月辞去董事职务。从那时起, HIH 的债务超过其资产达 40 亿美元。尽管如此, 那些受 HIH 债务影响和一筹莫展的人们却被保证说偿付即将来临, 但是要推迟几个月因为 HIH 的事情正在被清理。HIH 甚至发表一份声明说: “拥有大量储备来满足投保人的索赔要求”。结果, 200 万投保人失去了取出他们的钱并把这些投到其地方的机会, 现在全部输光。他们买保险是使自身受到保护, 多少是为了将来

的安全，他们几乎没人知道对这种将来的安全的最大威胁就是 HIH 公司把保险卖给他们。在下面的分析中，将证明投保人并不是唯一被 HIH 公司欺骗或至少是被误导的人。尽管澳大利亚股东协会在 1999-2000 年度全体会员大会上责备 HIH，但许多单独的股东还是可以理解地被 HIH 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准备充足的公开保证误导了。对 HIH 的分析将在福柯的能力/知识框架的背景下进行，将提出并研究关于公布的亏损的大小、HIH 平衡表的完整性和审计师是如何被说服去提供认为 1999/2000 年度财务报告体现真实与公允的观点这一无保留意见。

正如已经表明的，管理的失败和媒体的惰性是造成 HIH 倒闭的主要因素。具体地说，正如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所指出的，包括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对 HIH 公司不够格的管理是达不到对管理者所预期的标准的。另一主因素是缺乏审计师的独立性。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成员发现，审计师安达信公司并不是独立的，并没完成通常预期下审计师的工作和责任。（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003b,96 页）然而，应该指出对于审计师预期的差距，或者有关审计独立性和可靠性的预期的矛盾性由于额外的压力而变成武断的。按照福柯的知识能力及知识关系，在审计行业，能力掌握在作为专业知识的决定者审计师的手里。在 AUS302 的指导下，专业上的决定以及审计师在设计审计计划上的效率都影响审计师的知识。在 HIH，审计师（安达信公司）拥有的无形能力的诚实创造了由管理层压力引起的论文。

这种离题的作法导致安达信的独立性在许多方面受到损害（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2003b）。HIH 董事会包括安达信公司以前的 3 个合伙人；安达信的一个合伙人是 HIH 董事会主席并根据一项顾问职位协议得到酬金；一个安达信合伙人在经理部人员缺席的情况下同非执行董事会会后离开审计小组；安达信公司从非审计工作中获得大量酬金，这引起审计责任和利益的冲突。理论上讲，这段论述本不应该出现，审计过程本应该根据审计计划进行。正如福柯所说，能力和知识通过论文起作用。能力的关系“在没有拿出论文的积累、交流和所起的作用的情况下是不会自己建立、巩固也不会产生效果的。在没有对论文的思想体系进行某种适当安排（这是通过这种联想并在这种联想的基础上行事的）的情况下要行使能力是不可能的。”（福柯，1980，93 页）。安达信和 HIH 之间的关系，说实在的，还有安然公司，当然已强调了这种关系的潜在隐患，并且促进重新注意与审计行业正在进行的内外部检查与监督有关的职业道德。相反，瑞·威廉姆斯作为 HIH 的首席执行官看起来拥有绝对的权力，因为他支配着整个公司并在把朋友或助手引进董事会上起作用（Lipton,2003）。实际上，在高级管理人员无法对董事会负责任和董事会内缺乏独立性的发展过程中，瑞·威廉姆斯是起了作用的。

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绝地大反攻

当设立 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来揭露 HIH 倒闭的真相，并依法惩处应对受到的损失负责的个人和组织时，澳大利亚证监会同样也在调查 HIH 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受权调查范围是广泛的，包括：公司损失原因的透露、HIH 公司的董事、雇员和审计师所起的作用，可能的违法行为，联邦政府和州政府双方在规章制度管理和职责上的适宜性和恰当性（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报告，2003a）。此外，委员会成员被要

求同澳大利亚证监会合作以确保公司监督人员提出的民事或刑事诉讼不受不利的影响。(McCarthy,2001)。另一方面,媒体坚称存在着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危及澳大利亚证监会对 HIH 破产的审查的可能性,还认为澳大利亚证监会对董事的调查,特别是在 HIH 公司无力还债时,他们在允许 HIH 公司做生意上是否是疏忽的方面,已变成服从皇家委员会的政治主张了。(Clark,2001)。然而,考虑到 HIH 在政府保险方面特别是在新南威尔士州和昆士兰州有突出的表现,联邦主义的政治主张也是让澳大利亚证监会担心的事,因为它将出现在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 (McCarthy,2001)。

从福柯的观点来看,媒体的讯问、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和澳大利亚证监会的调查的联合形成了被福柯称为“体制的真相”的论文。(福柯,1980)。本质上这论文创造了真相。当它被认为是真的时(即使事实上它可能是错误的),它就有了强有力的影响。这潜在地提出了有关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调查结果的可信度的问题。对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相关问题是它有成为星室法庭的趋势。主要是因为皇家委员会通常有任意的议程,允许传闻的观点,对证据没有标准规定(Weller,1994;Prasser 1994)。通过规章制度管理(新的审计指南)管理上作出的反应已严厉取缔创造性的会计报告。

调查已经揭示,创造性会计、欺骗、贪婪、以及缺乏公司治理和道德行为是意外的公司倒闭的主要因素。随公司倒闭而来的职业会计团体和管理团体受到更加超乎寻常的仔细审查并不是令人吃惊的事情。HIH 的倒闭也导致澳大利亚保险业规章制度管理的具体改革。例如,从 2002 年 7 月 1 日起,特许保险精算师的服务已经成为强制性的了。特许保险精算师一般是澳大利亚精算师协会或者一个相似的职业团体的成员,并受职业标准的约束。联邦规章制度管理提供了整个国家的规章制度管理的概况。然而,澳大利亚的每一州对本州的规则和规章制度管理的制定负责,但是这些规章制度管理与联邦法律和规章制度管理体制相关。有趣的是,1990 年之前,公司和证券市场规章制度管理在很大程度上是州的责任。这是因为澳大利亚宪法的条款实际上把对公司进行规章制度管理的责任放在公司所在的州身上。在 1989 年,曾尝试将借助公司法的颁布将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置于联邦政府管辖之下。这样联邦、州和属地持一致看法将形成未来公司规章制度管理的基础。设立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ASC)执行这一法律。

然而,宪法的难题再次威胁到以联邦为基础的公司规章制度管理。但是在 2001 年,各州和属地同意认为对公司承担责任是联邦政府的职责时,这个问题得到解决。这导致公司法案在 2001 年 7 月颁布,该法案主要规定法律结构、公司的形式和运营。由以代 1998 年的澳大利亚证券委员会的澳大利亚证券和投资委员会(ASIC)来执行这一法律。

ASIC 是一个独立的合法机构。由 8 个成员组成执行委员会领导,尽管通常只有 3 个成员负责日常的运作。ASIC 也有责任管理金融服务部门的消费者保护和市场诚信。另外,ASIC 对审计师、清算人的注册负责,并且对经营投资、养老金、保险、存款提取和信贷服务并对这些服务提供意见的金融服务组织和专业人士的规章制度管理负责。自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初起,澳大利亚的公司法就已经成为进行中的在公司法经济改革计划(CLERP)下开展的复核和的改革的主题。这导致对公司法案进行重大变革的公司法经济改革计划法案(CLERP Act)的出台。它现今是第九版(CLERP9)。公司法案(2001)要求企业的财务报表符合相关的会计标准,并给出公司财务状况和业绩的真实和公平的意见。会计标准的目的在于确保报告的财务信息是精确的、可靠的和可比较的,使股东们能够评价报告实体

的业绩和财务状况。在澳大利亚，澳洲会计准则委员会（AASB）负责会计准则的制定和颁布。另外，公司法规定大多数公司有责任让有资格的审计师对自己财务报告进行审计。这一过程包括对财务信息的审查以决定其准确性，并符合相关会计准则以反映公司财务状况的真实和公平的意见。会计准则由法律强制实行，但审计准则没有法律效力。

结论：

HIH 公司的审计师安达信公司参与了不道德的公司文化。他们更关心客户的收入而不是收入的来源或者独立于客户。考虑到 HIH 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论文和媒体的论述的合生，主要关心的是对 HIH 调查所产生的范围广泛的负责任问题将被缩小到寻找犯罪当事人。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并不是把目标指向确定的罪行而是在对犯罪前的证据进行评价的基础上提出建议。这些建议意图在于改进并加紧公司的规章制度管理和治理。然而，管理者是在一个与奈维尔·欧文法官和皇家专门调查委员会提出的范例迥然不同的范例中行事的。尽管管理团体、规章制度管理的社会和公众利益基础固有地是政治的并使世界观规范化，而且试图通过规定正确/错误、道德/不道德、伦理/非伦理行为来建立“真实的体系”。（福柯，1980）。管理的过程试图通过对人的思维和行为模式施加影响来使生产的社会关系符合规范。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没能够在早期关于 HIH 失败的警告出现时有所觉察和行动，没对改革的结果给予足够的考虑，并且事实上是在过时的法律框架内运作。至关重要的是澳大利亚金融监管局和所有的管理保证制定标准的团体、他们的价值、词汇和日常工作事项都具有经济的、社会的和政治上的重要性。因为他们有能力去解释那些将引起注意或被忽视的问题。由于体制结构及其惯常做法始终和含义的改变、确定、价值和主观性等问题有牵连。他们有可能变成辩论、争议和斗争的活性部位。如何控制斗争依赖于更广泛的历史社会环境、“管理空间”的竞技者和他们能够调动的（历史的、文化的、政治的、组织的、金融的和能力）资源（Hancher and Moran,1989）。就审计师独立性的问题，伊恩·拉姆西教授在 2002 年发表一篇报告（拉姆西报告，2002），该报告就克服已被察觉到的审计师独立性缺乏的问题提出了大量的建议，包括让一个新的团体——审计师独立性监督委员会——对审计师独立性进行连续的监督和控制，同时修订了职业会计团体的道德规则，除了独立性的道德问题，外部审计师必须评价公司在接下来的报告年度内是否会继续存在。这通常是一个很困难的判断。这个判断涉及到大量的考虑，包括他或她的决定对股东的影响、未来的合同、同外部实体的关系以及贷方的支持。外部审计师的报告可能影响对这些事情的处理，并加速破产，这是本身就会成为事实的预言。

译者单位：厦门大学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
邮政编码：361005